

《百年潮》精品系列

改革风云

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谢春涛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胡绳访谈录……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万里访谈录……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对浦东开发思想历程的认识——访赵启正同志……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深圳证券市场的艰难崛起——原深圳市长郑良玉访谈录……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吴敬琏访谈录……扩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习仲勋主政南粤……任仲夷主政广东……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探索……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吴南生……袁庚谈蛇口的十年辉煌……一颗熠熠生辉的改革之星——追忆项南主政福建五年

GAIGE FENGYUN

上海辞书出版社

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

《百年潮》精品系列

改革风云

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谢春涛

GAIGE FENGYUN

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风云/杨天石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2
(《百年潮》精品系列)
ISBN 7-5326-1938-9

I. 改... II. 杨... III. 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IV. 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367 号

监 制: 张晓敏
统 筹: 唐克敏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姜 明 明 婕

《百年潮》精品系列

改革风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69 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5326-1938-9/D·44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86169958

题词者简介

- | | |
|------|------------------|
| 薄一波 |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
| 宋任穷 |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
| 程思远 |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 胡 绳 |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
| 萧 克 |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
| 张劲夫 |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
| 袁宝华 |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 任仲夷 |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 季羨林 | 北京大学教授 |
| 张光年 |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 刘大年 |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
| 金冲及 |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
| 蔡美彪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 章开沅 |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
| 张玉法 | 台湾中研院院士 |
| 巴斯蒂 | 法国全国科学院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
| 狭间直树 | 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
| 麦金农 |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龚育之

《百年潮》出精品系列,编者邀我作序,说:“你与《百年潮》有三重关系:既是读者,又是作者,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所以,这篇序,你非写不可。”我答:“说‘读者’,我的确每期都读;说‘作者’,我有时偶尔也作。只是‘主办单位负责人’一说,不能认同。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负责人’,对主办《百年潮》却没有‘负’起‘责’来。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不过,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写序之请也不可辞。

写点什么呢?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不妨称之为《百年潮》创业的“三君子”吧。

第一位“君子”是胡绳。办这个刊物,他是创意者。他是我的老领导。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四十年后,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我又是他的副手,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送别胡绳归来,我写过几则琐忆,在《百年潮》上连载,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这里就不细说了。单说《百年潮》的创办。

胡绳认为,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流转,这种“体内循环”的情况应当改变。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可读性强的讲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四十年代他写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很强的通俗性,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现在,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百年潮》。

说“于是就有了……”，说得轻松，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组织班子、约集稿件、编成刊物，并且坚持下来，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担负起创办《百年潮》重任的，是郑惠。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第二位“君子”。

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老同事。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二线”。他熟悉党史，又熟悉编辑工作。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编写和《胡乔木文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辑。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到了党史室，又先后主编过《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研究》。退到二线，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余热”。创办《百年潮》的建议一出，郑惠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说是支持，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从筹备到出刊，自筹资金（没有财政拨款），自配人员（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自办发行（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费尽了力。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刊物要办出品位、办出水准，关键是稿件的质量。郑惠交游广，信息灵，思路宽阔，眼光敏锐，不但提出选题，介绍关系，布置编辑四处组稿，而且亲自登门约稿，笑嘻嘻地同你谈，跟你磨，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百年潮》一出世，就显得很有生气，很有看头，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

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郑惠年逾七十，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百年潮》社长了，还是很关心《百年潮》的工作，并已开始《胡绳传》写作的准备。没有想到，二〇〇三年春天，郑惠在完成《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之后，也因癌症逝世。我在《百年潮》上写了一篇文章：《故人长忆亦长磋》，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其中说道：“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所做的最有影响、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创办《百年潮》。郑惠为这个刊物，真可谓呕心沥血，在学界赢得了声誉。而誉之所在，毁必随

之。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毛泽东与傅鹰》、《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都送给《百年潮》发表,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也就止于此了。”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

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三个人——第三位“君子”,是杨天石。郑惠为创办《百年潮》,罗致人才,请到了杨天石。郑为社长,杨为主编,好一对搭档。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篇学术论文,得到乔木很高的赞扬,这我是听说了的。但一直无缘谋面。他出任《百年潮》主编的时候,我和他还不相识。第一次同他见面,已是郑惠不再当社长以后,请杨天石继续当主编的一次会议上。这之后才有了交往,也并不密切,所谓“淡如水”吧。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他送给我他的著作:《海外访史录》、《横生斜长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关于蒋氏的一书,从海外到海内曾经激起一阵波澜。杨为批驳海外奇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百年潮》未能刊出,在《博览群书》和《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听说,有关方面对此书有了客观而平实的评价,才没有酿成什么事件。办《百年潮》对他来说属于兼职,他兼而尽职,兼而敬业,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对杂志倾注了很多心血。人事有更替,事业多磨砺,杨始终如一,坚守岗位,杂志办到今天,杨是功不可没的。

胡绳、郑惠、杨天石三“君子”,还有其他先后参与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成就了一番《百年潮》的事业。

《百年潮》创刊,提出了八个字:“信史,实学,新知,美文”,我很欣赏。史要信,要真,要言之有据,不可信口雌黄;学要实,要下功夫,要言之有物,不可浮泛虚玄;知要新,无论在史料方面,或是在观点方面,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文要美,倒不是辞藻要如何华丽,而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都要考究,不可马虎潦草。《百年潮》赢得声誉,恐怕就在这“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八个字的追求上吧。至于对一个刊物有称赞,有批评,本不足奇。学术是在争鸣中发展的。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最初提出百家争鸣,针对的就是中

国历史分期方面的不同学术见解。争鸣应该本着善意的态度,相互切磋,平等交流,而不是武断地乱扣帽子。争鸣应该开诚布公,而不是暗箭伤人。当然,作为一家刊物,不应讳疾忌医,而应从善如流,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办得为读者更加喜欢,更加满意。

《百年潮》取名“百年”,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从反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现代历史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则是八十多年,当代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已五十多年,这个历史过程还在延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百六十多年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也是最值得梳理、总结和反思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都应该总结和反思,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学习和总结历史,以观察和规划当前,古有明训。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说,每一个重大的新局面,不都是从清理历史问题着手而开启的吗?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都是在对历史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都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出来的吗?

《百年潮》从一九九七年开办,筚路蓝缕,十分不易。党史国史不易把握,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报刊市场竞争激烈,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人员经费捉襟见肘,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百年潮》的同志们在困难中坚持,到现在已近九年。精品系列九卷十二本,选取的就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一部分作品。所谓“精品”,当然是在编者看来的属于或近于“信、实、新、美”之作。其实并不见得都是如此,读者见仁见智,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也是可以争鸣的。不过,无论如何,把从创刊以来的文章,挑选、整理、编辑成九卷精品系列,编者是花费了工夫的。可以说是《百年潮》创业的一道轨迹、一个印痕。这是不是也算对《百年潮》自己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呢?

二〇〇五年七月

目 录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龚育之	1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	于光远	1
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傅 颐	38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	本刊记者 谢春涛	66
胡绳访谈录	郑 惠	86
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	郭道晖	97
万里访谈录	张广友	110
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张广友 韩 钢 记录整理	117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	吴 象	130
谷牧与 1978—1988 年的中国对外开放	曹 普	142
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杨 波	165
对浦东开发思想历程的认识——访赵启正同志	本刊记者 朱 地 姚 鸿	179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	张劲夫	189
深圳证券市场的艰难崛起——原深圳市长郑良玉访谈录	肖四如	196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吴敬琏访谈录	本刊记者 谢春涛	209
扩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	本刊特约记者 贺耀敏	224

习仲勋主政南粤	卢 荻	237
任仲夷主政广东	卢 荻 刘坤仪	252
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探索	梁灵光	263
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吴南生	卢 荻	275
袁庚谈蛇口的十年辉煌	何文辉 记录整理	290
一颗熠熠生辉的改革之星——追忆项南主政福建五年	胡宏等	301
《〈百年潮〉精品系列》编后话	杨天石	311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

于光远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和历史意义作出了明确的叙述。《决议》认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决议》列举了这次会议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所实行的许多重要转变，并认为这些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上述《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有关三中全会的那段文字时逐字逐句都注意过，认为其中除个别字句外，完全符合这个中央全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会议之后的事实。从这次全会到今天，二十年的时间快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决议》的评价并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二十年中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及其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其伟大。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五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三十六天。

我的这篇文章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那次全会通过的《公报》。《公报》指出：“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

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



邓小平

讲话时作了一个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公报》和《邓小平文选》中指出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回事？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在纪念三中全会时，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所应尽的一个责任。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出来，并且得到了解决；对妨碍党和国家事业的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充分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酝酿好了。这些，都已经取得三中全会多数与会者的共识。两个会议一个开得很长，一个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它是值得纪念的，不过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应该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

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它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间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而是当时我就不知道有关的情节。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为党和国家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汪东兴等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很深。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没有可能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高明得多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5月的八个月时间里,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只依靠汪东兴等几个人的小班子,并且在实际活动中坚持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所谓“两个凡是”,有三个大同小异的说法,通常指的是写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个方针,只要是毛泽东说过话、表过态的事情,包括路线、政策、理论以至人事,都不能改变。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也是毛说过话的,邓也就不好出来领导党和国家了。许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了。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广大干部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小平继续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大量“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

得不到解决。1978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二中全会(我列席了)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是代表),对国务院进行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始步入正轨。但是,思想上还是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我只能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改变不了文件的基本调子。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远没有解决。比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但当时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不少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还有人因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发表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社会上的民主受到极大压抑,党内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不乏其人。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很不正常的局面。

总之,在1978年秋冬之交,局势有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会议的通知。

会议的出席者

开会前夕,我到京西宾馆报到。报到时看到了出席者名单和分组名单,我就急忙而仔细地“研究”起来: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正式和候补委员全部通知到会。正式委员中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个常委,还有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十八人。这些人的立场平时我都留意,其中有些人,我同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普通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样,对他们有很强的反感。也有几个我有点看不起的,认为他们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见解。当然看了这张名单后,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十一届政治局的成员同十届政治局已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总的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其中有几位还是我所崇敬的老上级。

出席者名单上还有:

——中央军委常委:王震、粟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康世恩、王震

——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这就是现在说的“三副两高”,这些人我也是熟悉的。

——中国科学院:方毅、李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

两个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是全国人大任命的。本来一个院只邀请一人,大概因为方毅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加上李昌。

下面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十大军区的名单,通知了每个地方的一二把手到会。再下面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的名单,通知了各个机关的第一把手到会。这些人当中,除军队系统外,我熟悉的很多。他们的观点我也有所了解。

在这个名单上一共有 219 人。研究了这张名单后,我的印象有两条:一是它的规模不小,规格不低;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说到会议的规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召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有的很大很大,如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它相比就小得多,可是多数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都没有这次会议大。至于规格,特别是政治局的人都通知了,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而且参加者大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也有,但已经不占优势。因此,我看了这个名单之后就心中有数了,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

的会议。在这个名单上,还对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做了记号。我数了一下,名单中做了记号的有137人,占通知出席人数的63%,即将近三分之二;占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333人的42%。名单中其余的82人,都是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关担任主要职务的老党员,其中有的还是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仅我记得的,就有习仲勋、宋任穷、肖克、李葆华、肖华、胡耀邦、黄火青、胡乔木、韩光、蒋南翔、李昌等。也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补选的中央候补委员,如张爱萍、姚依林、王任重等。这都说明是一个高规格的会议。

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没有开什么预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华自己宣布会议开幕后,讲了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为此准备了两个讨论稿:《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和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会议也准备了一个文件。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说,在讨论三个议题之前,会议头两天先讨论一个问题,即要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79年1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希望大家答复:“这么做适当不适当?各级党委的工作如何实行这个转移?随着这个转移,明年要注意抓住几件什么大事?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怎样适应这个转移?”他宣布整个会议准备开二十多天,会议分六个组讨论,等等。这个会议没有设秘书长,在做主题报告时华国锋把本来应由秘书长讲的话都讲了。开幕式上四个副主席都没有讲话。

华国锋这次讲话不长,慢条斯理地也只讲了一个小时略多一些。我认真地听了。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一点也不聋,听得很清楚。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没有再讲“两个凡是”,而是在讲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整顿、调整和加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问题时,用了“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这

样的语言。这使大家联想到邓小平刚刚讲过的“完整、准确”。用“全面”、“正确”代替“完整”、“准确”，华国锋在讲话中故意改动这四个字，表明他并没有完全接受邓小平的观点，讲的是自己的话。对华国锋这个讲话我当然不会有过高的要求，我只是注意形势发展到了这样一步。

我注意到这个讲话中沿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前，毛泽东在南巡中对沿途见到的某些领导干部谈话时，讲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十次路线斗争的话，讲了他与十次错误路线进行过斗争，这十次是：

- 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 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 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 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 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 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 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十、林彪反革命集团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华国锋在十一大上针对“四人帮”的情况提出的。在这次工作会议上仍然使用这个说法，我听了十分刺耳，因为这就意味着全部肯定以往的十次路线斗争，其中包括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革”初期还称“刘邓路线”）的斗争，而这两次路线斗争涉及当时还健在又在“文革”中受尽迫害的许多老同志。使用这样的语言当然是有深意的。它可以抬高“历史上从来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一贯正确”的自己，贬低在“路线斗争中犯过政治错误”的许多老同志。不过他毕竟没有如此指明，要经过一番逻辑推理才能揭示出来。而且退一步说，也可以原谅他这些话是出自秀才的手笔。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想点穿。

对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重点转移，今天有人可能有所误解，以为他讲的是“以阶级斗争